

# 從一九五六到一九七〇年中共對非洲的外交政策

## ——正常化外交與大陸性革命之抉擇

白思康

### 前言

非洲無論是在殖民時代或獨立後，都一直是一個歧異複雜的大陸。無論其人種、部族、語言、宗教或文化都十分分歧。殖民體制却可謂是該地區之唯一共通點。然而殖民又造成各個不同地區在歷史、政治、文化上不同的演變。在五〇年代轉入六〇年代時，有許多地區因脫離殖民統治關係，而萌生很多國家。雖然這些國家都是在為民族認同 (National Identity) 作努力，然而它們的政治走向却不盡相同。面對這些遽然獨立的新興國家，中共必須重新研討其非洲政策。在此之前，中共只將非洲大陸視為一個整體來考慮。這些國家突然竄出於國際政壇，使得中共的非洲政策出現了矛盾。

從一九五六年中共與非洲初次接觸，到一九七〇年代中葉中共文化大革命結束止，這段期間內，中共對非洲的態度並不明朗。中共曾與一些非洲國家建立外交關係，而這些國家並非都是激進派。中共並且鼓動顛覆活動，然而，其所鼓動之顛覆活動並不一定是以推翻「反動派」政權為目的，它也可能是在反對「激進派」政權。

某作家認為從中共的態度可看出兩種政策：建設性政策與破壞性政策。①建設性政策包括純粹的外交承認、外交人員的互派、貿易往來、技術合作或經濟援助等。破壞性政策則專指革命活動。例如，對叛亂活動提供軍事上或財政上的支援。不過我個人認為若將此二政策視為一體之兩面似乎更為恰當些。

這個立論，從中共對多數非洲國家遽然改變態度或對同一國家同時採取這雙重態度，便可得到證明。如果將此雙面政策解釋為兩種截然不同的政策，則表示中共有兩個不同的目標要達成。然而，此時期的中共，對於非洲似乎只有單一的目的而已；那便

註① Alan Hutcheson, *China's African Revolution*, Westview Press, 1975, Chapter VIII: "Constructive Policies 1964-1966"; Chapter IX: "Disruptive Policies 1964-1966".

是，將整個非洲大陸革命化。也許中共非洲政策確實具有破壞性與建設性。但是，其實所有革命的破壞與建設，都是爲了同一目標的。中共對非洲同時採用雙面政策，不過是中共因應非洲各國情況，將其革命計畫作了適當的調整而已。中共爲實現其非洲革命化的目的，必須對這些五花八門無從歸類的非洲國家個別處理。中共選擇讓有些國家扮演「革命先鋒」的角色，有些只是作爲革命戰場。中共視這些國家對未來革命參與方式的不同而決定對其採取建設性或破壞性態度。我們必須探討，中共爲了達成非洲大陸性革命，在外交上，其與非洲各國接觸所依據的原則爲何？

非洲國家中，除了阿爾及利亞與肯亞外，沒有任何一個是經由革命而獨立的。②中共面對這些無論在政治上、經濟或軍事上都仍然十分依靠過去殖民政權的國家，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態度呢？它是否應該承認這些「傀儡」政權呢？

這個問題固然與中蘇共糾紛有關，但非洲領袖們的態度亦不無影響。蘇聯慶幸非洲的獨立運動逃過了一場暴力，並喜見新興國家中存在著一個和平區，蘇聯可自由與這些國家往來。中共雖不願採取與蘇聯相同的「低盪」政策，③却也不能忽略這些新興國家。④在外交上，這些國家可幫助中共踏入聯合國。中共也不願將非洲空出來給中華民國。⑤而且，這些新興國家若承認了中共，則對中共對抗美國孤立政策的鬭爭來說，無異是一種勝利。

至於這些非洲國家，也無一甘願其國家之獨立因任何革命計畫而受到否定。中共爲協調其兩大必要性——採取不同於蘇聯之強硬立場的必要與接受新興獨立國家的必要——必須修正其革命理論。中共於是改而自稱爲「未來革命——先由國家性革命，而至大陸性革命——的捍衛者」，才得以在思想上，爲其承認新興傀儡國家的作法，自圓其說。中共認爲，既然這些國家的獨立未嘗經過革命，則其獨立應作爲未來革命的出發點。中共寄給非洲各國的賀詞，無非是給它們的一個警惕；告訴他們鬭爭方才開始。

這個言論的好處，在於強調中共的非洲政策，是與蘇聯的猶豫態度有十分不同的革命立場。中共藉表現其強硬革命觀念，來強化其在革命世界中領導者的地位。不過，中共也因決定承認「準獨立」國家，而必須對自身之革命理論重新檢討，而後加入一個新觀念。亦即，提出國家性革命的觀念。中共的這個改變，說明了中共對非洲外交上的模稜態度。

註② Alan Hutchison: *op. cit.*, p. 8.

註③ 「若以『現代修正主義』所提倡的『和平共存』爲名，去承認舊殖民政權爲了繼續保有對殖民地的政治、經濟、軍事控制而賜予的獨立，就等於是在承認帝國主義者可任意對非洲人民施行暴力統治，而被殖民者却沒有以合理暴力去推翻不合理暴力的自由。」引自 Feng Chih-Tan 文章，摘自 Zbigniew Brzezinski ed, *Africa and the Communist World*, Stanford, California, p. 191.

註④ Alaba Ogunsanwo, *China's Policy in Africa, 1958-1971*, Cambridge Univ. Press, 1974, p. 62.

註⑤ Alaba Ogunsanwo, *op. cit.*, p. 71.

中共在呼籲這些國家的疆界只是暫時性的同時，還是不得不承認非洲革命必須先以國家為範圍。然後再將這些國家的革命<sup>⑥</sup>擴充為大陸性革命。每一個國家都扮演著一個「解放區」的角色，如此將革命蔓延到鄰國，是為一種骨牌策略。此亦即中共赤化中國大陸時所使用的伎倆。如今中共將之應用於國家眾多的非洲大陸。中國大陸之解放區本身並非中共赤化的目標，它只是中共在達成赤化全中國時的一個過渡階段而已。同樣地，非洲的國家性革命也不是中共真正的目標，其所以應受重視，乃因其對落實非洲大陸性革命有所助益。所以，外交關係的建立和支援國家性革命，不過是骨牌政策的一體兩面而已；中共一方面利用非洲領袖們，另一方面又利用叛亂活動，來推廣其革命。所謂的「建設性」政策，其實不過是在幫助「破壞性」政策的進行而已。

外交政策一旦列為全非大陸性革命計畫的一部分，則必須遵守兩大前提：

一、顛覆活動重於外交活動。

二、大陸性革命重於國家性革命。

這兩大前提顯示出，外交活動無論如何不可對顛覆活動造成阻礙，尤其在維持中共革命者形象上，更須注意。外交關係之建立唯有當該國境內無顛覆之機可乘時，方得行之。繼之再考慮第二大前提。例如，當與該國建交比鼓動其境內顛覆活動，更能對大陸性革命有所貢獻時，則當以大陸性革命為重，和該國建交。

中共在選擇建交對象時，其所根據之準則有三種：

一、該國政府是否為激進派，並能追隨中共之政策，鼓動非洲其它地區的革命活動？在此種國家內，中共無須從事顛覆活動，因為該政權所宣傳者即為激進思想。此外，該政權的激進作風可使大陸性革命直接受益。所以建交可行。

二、該國是否因其戰略性地理位置，而能對傳播大陸性革命有所幫助？此點亦是在強調大陸性革命比國家性革命重要。尤其當地理戰略價值國家非為激進派時，更能看出中共對大陸性革命的重視。在此類國家中，大陸性革命的目標比國家性革命的目標重要，外交活動也比顛覆活動更具價值。

三、該國境內是否存在一個足以推翻政府當局的叛亂組織？若然，則應鼓勵國家性革命，因為這將有益於推廣大陸性革命。不過，這個叛亂組織必須具有效率與實力，中共才願為之放棄外交。

中共對每一個非洲國家，都將這三種準則綜合考慮，然後再決定其外交態度。為使本研究報告更加清晰明白，茲將中共之外

註<sup>⑥</sup>

「如果有一、兩個獨立國家發起了真正的民族革命，則可帶來很大影響，造成遍佈整個非洲大陸的革命潮流。」引自中共刊物 *Bulletin of Activities*, No. 17 (1961), in *China News Analysis*, No. 501; cited by Dr. John C. Kuan; *Notes on Communist China's Foreign Policy*, Asia and World Institute, Taipei, Taiwan, R. O. C., 1980, p. 17.

從一九五六到一九七〇年中共對非洲的外交政策

交態度歸分成三類來討論：

一、熱烈的態度：

當外交將有利於大陸性革命時，中共採取熱烈外交。中共採取這種態度的外交對象，有兩類國家：一類是隨時準備支持革命活動的激進派國家；另一類是在傳播革命上，具有地理策略價值的國家。對於第二類國家，中共十分留意，不去鼓動其境內之國家性革命，以免損及該國對大陸性革命的利用價值。

二、不建交態度：

當外交與革命衝突時，外交關係無法存在。當一國之叛亂活動必可造成政局的紊亂時，中共即使明白可能造成外交阻礙，也會無條件地支持該叛亂活動。由於這類國家不但不具地理策略價值，且其境內有強大叛亂勢力，所以扶助其境內之顛覆工作比與該國政府建交更為重要。不過，有些國家，其境內雖無中共支持之叛亂組織，却對中共在其它國家的顛覆活動十分反感。這些國家純粹因其當局對中共革命宣傳的警惕，而拒絕與中共建交。

三、形式外交的態度：

當和一個國家建交與否都不致影響到革命計畫的進行時，中共便對其採取形式外交的態度。這類國家即使不幫助中共搞革命，但願意承認中共政權的國家。這些國家的境內，必須不存在任何足以令中共認為有支持價值的叛亂組織。這些國家由於無論在國家性革命或大陸性革命上，都毫無展望，故中共可與之建立「萬隆會議式」的外交。

## 壹、對革命有利時之外交態度

中共對兩類國家特別感興趣；一類是具有與中共之非洲國際政策相投合之激進思想的國家。另一類是雖在思想觀念上與中共不盡相同，却因其地理位置而能對中共非洲全盤革命計畫有所助益的國家。

### 甲、不具有強大反對勢力的激進國家

這些國家包括阿爾及利亞、埃及還有幾內亞、馬利和迦納。這些國家是中共在非洲真正的擁護者至少到一九六四年以前一直是如此。其中主要是北非和西非國家，因這兩地區激進國家為數眾多。並且這些國家均具有一共同特色，即：曾經與帝國主義國家或由帝國主義國家所扶持建立之溫和派政府發生過激烈衝突，是以它們都自認為革命老大。

阿爾及利亞經多年反法鬭爭才得以獨立。①埃及在蘇伊士運河危機中成功地反抗西方帝國主義國家。這兩個國家爲中共提供了表現其對非洲革命熱忱的首次機會。幾內亞領袖 Sekou Touré 曾在布拉格唸書。當他將其政黨組織成「非洲民主聯盟」支部之同時，也曾領導「法國總工會」幾內亞分會。「非洲民主聯盟」長久以來即爲共產主義的信徒。②馬利一獨立，便在其領袖 Keita 領導下走上了社會主義路線。迦納對帝國主義國家及其在非洲之殘餘勢力，態度皆十分挑釁。迦納領袖 Nkrumah 長久以來一直與 Nasser 互爭卡薩布蘭加聯盟領導之地位。Nkrumah 在鄰國政府革命思想不夠堅決時，便毫不遲疑地鼓動該國反政府活動。③ Nkrumah 主動與中共接近。然而他所寄望于中共的並非經濟上的援助，而是幫助他訓練游擊隊，以滿足他對非洲的政治野心。④

這些國家都已準備好要鼓動非洲其它地區反對殖民政權或殖民者所扶持成立之溫和派政府。

此外，這些國家的言論與中共十分相近；都是在抨擊美國及一般的帝國主義。⑤總而言之他們極欲加入由中共帶頭的政治行列。馬利便是少數在核子禁試協議問題方面支持中共的國家之一。這些國家在內政方面效法中共。阿爾及利亞和馬利便因此而有人民自衛隊，幾內亞則模仿中共進行大批投資人力計畫。馬利和幾內亞（此外布薩維爾剛果與坦桑尼亞亦然）也都有文化大革命的翻版。⑥因之這些國家不僅有助於提高中共的國際地位，且對中共的革命策略有所助益。

中共則以允諾這些國家一些好處，作爲回報。例如派遣有聲望的大使到這些國家，經常正式邀請這些國家的領袖們訪問中國大陸。⑦在這個時期得到最多中共經濟援助的便也是這些國家。⑧不過中共的經濟來源相當有限，⑨尤其又有一個較有財源的蘇聯與之匹敵，中共更應該用財得當。在迦納、幾內亞或馬利等國，中共最後還是將蘇聯的援助排擠了出去。中共的援助方式確實

註① 對中共而言，阿爾及利亞戰爭很可能就是「殖民和半殖民國家革命的傳統典型」。Lu Ting-yi 曾寫道，中共的模式對這些國家來說具有「無可計量的價值」。如果這個以毛澤東游擊戰略爲基礎的戰爭，能够獲得勝利，則表示中共的革命方法是正確的，並可使中共革命成爲非洲大陸其他地區的榜樣。

Cf Alan Hutchison, *op. cit.*, p. 25.

註② Alan Hutchison, *op. cit.*, p. 53.

註③ Alan Hutchison, *op. cit.*, p. 58.

註④ John C. Kuan, *op. cit.*, p. 19 et. 20. Alan Hutchison, *op. cit.*, p. 123.

註⑤ Bruce D. Larkin, *China and Africa, 1949-1970,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niv. of Calif. Press, Berkeley, 1971, p. 176.

註⑥ Bruce D. Larkin, *op. cit.*, p. 176.

註⑦ Bruce D. Larkin, *op. cit.*, p. 176.

註⑧ 在文化大革命前，得到中共經濟援助最多的國家爲埃及、阿爾及利亞、幾內亞和迦納。Cf Alaba Ogunsanwo, *op. cit.*, p. 276, table 9.

註⑨ 關於中共援助計劃因資源不足及後勤困難而受到限制，見 Cf Waldemar A. Nielsen "The Great Powers and Africa", Praeger Publishers, New York, 1969, p. 229.

是比較適合於這些國家的情況。中共較著重於農村計畫，而蘇聯則比較鼓勵可提高聲譽的大規模工業計畫。這不僅是中、蘇在手段上的差異，更是兩個國家在非洲應如何演變的看法上意見相左。蘇聯認為要使共產主義在非洲獲得勝利，必須仰仗無產階級，所以蘇聯將重點放在工業化上。<sup>①⑥</sup>相反地，中共在革命理論中所強調的却是農村羣衆的角色。中共的經濟、技術援助是以農村小規模計畫為型態，只須少量金錢上的投資，主要是以人力投資為基石，並可以很快回收。<sup>①⑦</sup>這些特點對西非落後國家很適合。此外中共在經濟援助方面又表現得很大方，提供長期無息貸款。<sup>①⑧</sup>中共所派遣的技術人員不像蘇聯技術人員般自命不凡，故在整體上說來，比蘇聯技術人員更能為當地人士所接受。

不過，不幸地，中共的經援政策雖在西非暢行無阻，到了北非却觸礁了。因為北非國家多數已達相當工業化水準，因此不會被中共的「未開發」援助所吸引。<sup>①⑨</sup>

## 乙、地理位置有利於大陸性革命的非激進國家

當一九五八到一九五九年間中共開始對北非西非發生興趣時，中共對革命戰鬥抱有很大的希望。然而很多非洲國家却沒有經過戰鬥便獨立了。中共並且感到，將會在北非遭遇到方興未艾的阿拉伯民族主義的阻撓。<sup>②①</sup>凡此種種，加上中共在此一地區提供經濟援助不成，使得中共自一九六三年底起將目標轉向東非，特別是坦桑尼亞，因為情況令人日愈明白，非洲若有什麼可資利用的革命情勢，那必定是對最後的殖民勢力以及如安哥拉、莫三鼻克或羅得西亞等國種族隔離政策的反抗。

中共便是因為考慮到大陸性革命，才會對坦桑尼亞發生了興趣。索馬利亞和尚比亞也可算是這類國家。東非國家不僅可使中共更向革命情勢邁進，並且它們得印度洋之便，在地理上具有較接近亞洲的優點。中共對於西非確實曾因地理上的偏離而感到不便。最後，還有一個造成中共非洲政策東移的原因，那便是西非國家經濟過於落後，無法滿足中共外貿上的需求。而東非却能為中共提供大量棉、銅等物資。<sup>②②</sup>

註①⑥ 然而，蘇聯主張快速工業化，故傾向於對非洲當地經濟的全面干預，蘇聯這種作法，一旦經濟發生危機時，很可能會被認為是禍首。並且蘇聯的援助方式，常是作一些提高非洲國家名氣的計畫，這些計畫對大部分的非洲國家的落後經濟來說，是沒有用的。Cf Alan Hutchinson, *op. cit.*, p. 49.

註①⑦ Alan Hutchinson *op. cit.*, p. 49.

註①⑧ Alaba Ogunsanwo, *op. cit.*, p. 2.

註①⑨ Alan Hutchinson, *op. cit.*, p. 63.

註②① Alan Hutchinson *op. cit.*, p. 80.

註②② Alan Hutchinson, *op. cit.*, p. 81.

因此，自一九六四年起坦桑尼亞的達累斯薩拉姆差不多取代了開羅和迦納的科納克里（Konakry），成爲中共在非洲革命活動的新司令部。中共真是選對了地方，因爲這裏正是「非洲統一組織」專責脫離殖民事務的辦事處所在。至於索馬利亞則具有控制蘇伊士運河出入的策略價值。然而使得這時期的中共對坦桑尼亞、布隆地和中非共和國建立起「地理策略性邦交」的所有原因中，最重要的恐怕是因爲它們鄰近金夏沙剛果。金夏沙剛果是中共此一時期革命活動的優先戰場。

這就是爲什麼中共會對這些國家採取塑造自己美好形象的策略，以及儘量不提革命理論，也注意不去插手它們內政的原因。中共的這種外交態度與其對革命遠景無大關係之國家所採取的態度非常近似。唯一重要的不同點是，中共在推展「地理策略性邦交」時的態度是像在推展「激進派邦交」時一樣熱烈。中共像對待激進派國家一般，將它微薄經濟援助中的大部分保留給「地理策略性邦交」國家。因爲在這些東非國家中，大陸性革命的利益遠超過了國家性革命的展望。因此，必須注意避免對這些革命思想尚未成形的國家要求思想上的支持。也不宜鼓勵其境內之叛亂活動。此外，對於這些國家所帶來的好處，要報之以大量的經濟援助。坦尚（坦桑尼亞、尚比亞間）鐵路的修建便是中共在非洲提供的最大援助之一。<sup>②</sup>

中共得到相對的好處是在這些國家成立有力的使館。這些使館經常就是中共外交人員訓練中心。達累斯薩拉姆的中共使館不止在該國，就是在全非算來，恐怕也是最大的訓練中心。這些國家正合了中共的目的，爲顛覆活動提供了很多幫助。它們允許中共在其領土內建立由中共專家們所主持的游擊隊訓練中心。過去的迦納一直到一九六六年 Nkrumah 下臺前都是如此。在軍火方面，中共提供金夏沙剛果叛亂份子所需的武器，都是經由坦桑尼亞、布隆地、中非共和國以及非洲唯一實行「人民共和」政體的布拉薩維爾剛果運達的。直到金夏沙剛果政局穩定下來，Mobutu 上臺前，這些國家在策略上對中共具有無比價值。其後中共便進入文化大革命狀態，於是它在非洲的具體活動也只得暫停。

## 貳、與革命衝突時的外交態度

屬於這一類的國家還可以再區分爲兩種：一種國家是中共雖未因革命策略的關係而不與之建交，然而它們却很提防中共，因此反對與中共建交。另一種國家是，中共確實在其境內從事顛覆活動，故不宜再與其建交。

### 甲、不可避免的外交損失

註② 42-Thomas H. Henriksen ed, "Communist Powers and Sub-Saharan Afri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Stanford Univ., 1981, pp. 98, 99. 關於坦尚鐵路，見 Alan Hutchinson, *op. cit.*: chapter XV.

這個損失純然是由中共自己的宣傳所造成的。中共的非洲大陸性革命化策略，顛覆活動的進行和宣傳口號都招致多數反動派甚至溫和派國家的不信任。這些國家本來是可以保持中立而不至於拒絕中共建交的。

以上這些國家中大部分都是法國舊殖民地，例如查德、加蓬、岡比亞、象牙海岸、塞內加爾、多哥、上伏塔和馬達加斯加。此外還有非法國殖民地的賴比瑞亞和利比亞。這些國家在脫離殖民地地位後仍與法國十分親近，它們之中除岡比亞以外都承認中華民國政府。塞內加爾雖願意承認中共政權，却也不願意和中華民國斷交。<sup>②</sup>

中共因為在這些國家內沒有值得支持的叛亂活動，而且這些政府對中共不友善，所以中共在這些國家中既無顛覆活動又無外交可言。這些國家一直要到文化大革命以後，中共改採攻勢外交時，才一一承認了北平政權。中共對於這些國家的敵意並不在乎。因為這些國家大部分都是落後國家，在其內部有國家建設方面的困擾，而且它們在國際上又沒什麼地位，而且除了利比亞與塞內加爾外都沒有什麼國際政治抱負。無論在提高中共國際聲望上或在中共的非洲大陸革命策略上都不能有立竿見影的好處。中共甚至認為沒有必要像對那些不會對革命造成影響的友邦一樣地以熱情或體面的態度去博得它們的好感。

不過中共有時也會對原本有邦交，後來却中止了的外交挫折感到惋惜。例如中非共和國和達荷美由於中共的革命宣傳而與中共斷交，即為一例。

中共對中非共和國政治並無干預的跡象。中共自一九六四年以來一直與中非共和國有邦交，主要是為了實行其金夏沙剛果革命化策略。與中非共和國建交中共便可以深入非洲心臟地帶，所以中非共和國也屬於中共「具地理策略價值之友邦」。中共提供給中非共和國一千四百萬里拉貸款，終於贏得班吉(Bangui)當地領袖的「芳心」，於是同意與中華民國斷交。<sup>③</sup>

中共與中非共和國關係的惡化，始自一九六六年當 David Dacko 總統為其表親 Jean-Bedel Bokassa 迫請下臺時。Bokassa 自稱將他的國家從「中國人的攪局」中拯救出來。政變六天後，中非便與中共斷交。中非指控中共意圖在中非成立「人民軍」。其實，可以解釋 Bokassa 這種態度的理由只有一個，那便是，他曾經在中南半島為法軍作戰，因此對中共仇恨至深。另外有一點，我們也應特加說明，那就是中共都是因為要塑造自己成為「非洲革命的捍衛者」才給了 Bokassa 一個推翻他表親的好藉口。

同月，在達荷美也發生了類似中非共和國的事件。<sup>④</sup>達荷美自一九六四年以來一直與中共有邦交，其領導人 Christophe Soglo 將軍和 Bokassa 將軍一樣，也是靠武裝政變奪得政權的，而且，也曾與法軍一起抵抗越共。他根本連找個藉口指控中共

② Bruce D. Larkin *op. cit.*, p. 178.

③ 關於中非與中華民國的斷交，見 Alan Hutchinson, *op. cit.*, p. 120 et 121.

④ Alan Hutchinson, *op. cit.*, p. 122.



陰謀都省了。政變後三個月，他便與中華民國建交。中華民國農耕隊的表現，在一九六四年以前便給了他深刻的印象。

雖然，對於這兩個國家的外交惡化，中共因失去了一些大陸革命的地理策略價值而感到十分可惜，不過這並不表示中共對所有的斷交情況都有這種感覺。某些國家與中共斷交，甚至是由中共主動挑起的。一九六五年與布隆迪斷交，一九六六年與迦納斷交，一九六七年與突尼西亞斷交（中共與突尼西亞長久以來的外交關係都很形式化而又困難，因此在後文中我們會再另行討論）皆為其例。<sup>②</sup>

迦納領導人 Nkrumah 在一九六六年下臺，使得其所領導並由中共技術人員協助，以對抗非洲溫和派政權的顛覆陰謀暴露了出來。<sup>③</sup> 迦納新政權雖將中共技術人員驅逐出境，却並非極欲與中共斷交。若中共表現出改過的態度，也許便能再度贏得迦納政府的好感。然而，中共斷然表示支持 Nkrumah，想必是中共不願失去「革命面子」。因此中共與蘇聯不同，它仍能在非洲激進派領袖的眼中，保住其「非洲革命捍衛者」的美名。中共既然不能再在迦納境內訓練鄰國叛亂組織，那麼能不能進入迦納境內，對中共便不重要了。<sup>④</sup> 這一點也許就是中共過去之所以與 Nkrumah 接近的原因。

布隆地在金夏沙剛果革命鬥爭中也扮演了策略上極其重要的角色。<sup>⑤</sup> 中共為了贏得布隆地當局的好感，毅然支持鄰國盧安達境內的貴族反對勢力，因為這個反對勢力和布隆地領袖階級同為少數民族中的 Tutsi 族。中共支持君主主義的反對勢力，去反抗一個由多數民族所掌握的政權，而不顧這個政權是代表了盧安達境內以農民羣眾為基礎的百分之八十五民意，這是一個破壞性的政策，中共無法對此提出任何思想觀念上的自我辯白，此乃笨拙之計，如此政策必引起 Nyerere, Sékou Touré 等非洲激進派領袖們的譴責而已。中共這種策略，是以大陸性革命為目的，所以必須討好布隆地，而討好布隆地就必須支持盧安達貴族反對勢力。<sup>⑥</sup>

然而，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布隆地的政局有了變化，因此使得中共為求剛果革命化的策略以及動搖盧安達政權的計劃都受挫。布隆地總理被控與中共過於親近，因此被撤職。不久，他的接班人遭人暗殺，當局即認為此事與中共使館有牽連，因此決定暫時中止兩國的外交關係。<sup>⑦</sup> 中共對此一外交損失似乎並不感到遺憾，因為如此一來，它對盧安達的矛盾外交便可以告一段落。這個矛盾外交政策，短程上看來，雖然可以動搖盧安達政局而博得布隆地的好感，然而就長遠看來，却會在盧安達建立起貴族政體，

註② Bruce D. Larkin, *op. cit.*, p. 173.

註③ Dr John C. Kuan, *op. cit.*, pp. 18-23.

註④ Bruce D. Larkin, *op. cit.*, p. 173.

註⑤ 布隆地被中共認為是「進入金夏沙剛果的門戶」

註⑥ Bruce D. Larkin, *op. cit.*, p. 174.

註⑦ Alan Hutchison, *op. cit.*, p. 115.

註⑧ Cf Thomas H. Henriksen ed., *op. cit.*, pp. 101, 102

而對大陸性革命的推展造成阻礙。

## 乙、斷然犧牲的外交關係

喀麥隆和金夏沙剛果都是屬於中共優先考慮革命遠景而決定放棄其外交關係的國家。不過，這兩國的情況並不完全相同。

中共對喀麥隆<sup>②</sup>的革命支援可以遠溯至喀麥隆獨立前，因為喀麥隆創立於一九四七年的反殖民組織——喀麥隆人民同盟——在五〇年代末是由北平與莫斯科所支持的。<sup>③</sup>一九六〇年一月法國同意讓喀麥隆獨立，蘇聯便立即承認了法國政府撤走時扶持成立的 Airdjo 政權。<sup>④</sup>蘇聯答應利用它在人民同盟中的影響力，去引導人民同盟與其政府談判。<sup>⑤</sup>中共立即予以揭發並譴責蘇聯，謂其既缺乏革命熱忱又和帝國主義國家掛鉤。

中共就是爲了與蘇聯劃清界線才會採取如此堅硬的革命態度。也因此，中共不得不無條件地支持喀麥隆人民同盟。不過，一方面喀麥隆當局並不敵視中共，另一方面，人民同盟在其領導被刺以及該黨多次分裂之後，力量便很快地削減了。

喀麥隆可算是中共在取決其外交態度時優先考慮「革命性」而不重視「革命力量大小」的唯一國家。我們曾探討過，中共因爲財源十分有限，所以只能支持它認爲力量大，可能會成功的叛亂活動，然而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以後的喀麥隆人民同盟早已不處於如此狀況了。中共之所以仍舊支持喀麥隆革命運動是因爲不願自己在批判蘇聯態度之後，自己還做出沒有「革命面子」的事。<sup>⑥</sup>

中共一直要到喀麥隆當局於一九七〇年底全面掃蕩了人民同盟的殘餘勢力後才於一九七一年與喀麥隆政府建立外交關係，以圖提高自己的國際聲望。<sup>⑦</sup>

剛果的革命潛力比喀麥隆強大。一九六〇至一九六六年間，中共的非洲外交政策取向與剛果政局的變化關係十分密切。這一點可以解釋，爲什麼中共會對坦桑尼亞，以及一些較不重要的國家，如布隆地、中非共和國等發生興趣。據說毛澤東曾說過：「

② Bruce D. Larkin *op. cit.*, pp. 34, 85, 133, 179.

③ Richard Gibson "African Liberation Movements", Institute of Race Relations, London, Oxford Univ. Press, 1972, p. 6.

④ Zbigniew Brzezinski *ed. op. cit.*, p. 174.

⑤ Zbigniew Brzezinski *ed. op. cit.*, p. 174.

⑥ Bruce D. Larkin *op. cit.*, p. 179.

⑦ Alaba Ogunsanwo *op. cit.*, p. 243.

如果我們取得了剛果，整個非洲就都是我們的了。」<sup>②</sup>此即其骨牌政策的最佳說明。<sup>③</sup>

一九六〇年剛果獲得獨立，接着馬上是一段無政府狀態和暴亂時期喀坦加 (Katanga) 要求脫離本土獨立、反抗比利時僑民的暴亂及比利時軍事干預，北平與莫斯科方面都企圖從混亂中謀得一些利益。對中共而言，這是難得可以利用來誘使美國插手干預的非洲國家。剛果總理 Lumumba，果真向聯合國求救，請其為剛果平定亂局。蘇聯因認為聯合國不致採取行動，便投票贊成出兵支援。中共便利利用這機會揭露了蘇聯的「天真」及其與帝國主義國家的勾結。並且還指控蘇聯缺乏革命熱忱。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三日，出乎蘇聯意料之外，聯合國通過派兵支援剛果。於是，美國便捲入了這場是非。

然而，Lumumba 總理被撤職，由 Gizenga 接任其位。新總理向中共求援，致使一位軍人 Mobutu 起來推翻政府。Gizenga 祇得流亡史坦萊市 (Stanleyville)，在該地成立自己的政權。這一政權為中共與蘇聯所承認。在這同時，Adoula 亦於利奧波德維市 (金夏沙舊名) (Léopoldville) 成立了溫和派政府。蘇聯斡旋於這兩個政權之間以作調停。蘇聯與中共於是又和利奧波德維市政權有所接觸。然而，Gizenga 被殺後，Adoula 承認了中華民國，中共只得與 Adoula 政府斷交。自此北平方面竭力支持 Gizenga 信徒，以反抗帝國主義，及被中共所指控為背叛革命道統的蘇聯。<sup>④</sup>

從此以後，一直到剛果在 Mobutu 的統治下政局漸趨穩定前，剛果一直都是中共非洲革命的中心。中共一直等到文化大革命開始發動「通通承認」的外交政策時，才不再將 Mobutu 視為「帝國主義的走狗」，而與其政權建立起外交關係。

### 叁、對革命沒有影響時的外交態度

介於以上所介紹的兩種極端外交態度中間，還有一種比較尋常，比較通用的外交態度。中共採取這種外交態度的對象是，那些與其建交也不會影響到非洲革命之進展的國家。以下我們先闡述這種外交政策，接著再分析何以此一與文化大革命之極端作風很不相稱的溫和外交態度，能經歷文化大革命而依然延用不輟。

#### 甲、對非激進國家無地理策略價值的國家以及不存在反對勢力的國家所採取的尋常外交態度

② Alan Hutchison, *op. cit.*, p. 111.

③ 「不管得勝或失敗，都很明確地，中共還是認為將之應用於非洲是對的。」 Cf Bruce D. Larkin, *op. cit.*, p. 168.

④ Alan Hutchison *op. cit.*, p. 111 et. 112.

這類國家包括摩洛哥、突尼西亞、蘇丹、烏干達和茅利塔尼亞。此外還有索馬利亞和尚比亞，也都是被中共利用為提升其國際地位之邦交國家（不過索馬利亞與尚比亞同時還具有地理策略價值）。這種外交關係，乃「文革」後，中共改變其「革命化政策」為「攻勢外交政策」，而普遍對所有非洲國家採行之外交序曲。

中共和這些國家間的關係靠一個默契來維持，這個默契就是，互不干預，也不過問彼此事務。這種態度與中共在對待具「地理策略價值」國家時的態度是一樣的。中共與這些國家間沒有任何一方會去強調彼此在政治上、思想上、觀念上或社會方面的差異。<sup>④</sup>並且中共對這些國家所給予的批評也都能承受。譬如突尼西亞便是其中最常批評中共的國家，中共至少都還能做到不把它當一回事。這些國家中沒有一個願接受中共的政治思想。它們對付中共的態度都很謹慎。其與中共建交的原因乃是它們希望成為不結盟國家，或是因為它們要與非洲尚未解放的國家一起反抗殖民主義；摩洛哥和突尼西亞所以與中共建交就是為了支持阿爾及利亞戰爭。<sup>⑤</sup>尚比亞雖然對中共的政治活動有些提防，不過對於羅得西亞、南非或莫三鼻克的革命變化也不無支持。

在中共看來，與這些國家建交並無任何不可的理由，因為在這些國家的內部都沒有存在著中共認為值得支持的反對勢力。同樣地，中共也無須對他們過於熱情，因為這些國家所能帶給中共的好處不大，而且也不具有地理策略價值。既然如此，那麼中共又為何不像對待那些法國舊殖民國家，如象牙海岸、多哥、加蓬或岡比亞一樣，甘脆不管他們呢？（見第二節乙部分）這大概是因為他們比較不屬於反動派的關係。不過最主要原因可能是因為它們在經濟上具有重要性，而且其中大部分的領袖，在國際上都很有地位。中共若得罪這些領袖自非明智之舉。不過中共與這些國家間的和睦關係主要都只是在很傳統的事務方面，因為雙方間的往來大體上只是經濟交易罷了。

因之，這些國家中以摩洛哥、蘇丹、烏干達與中共的貿易關係最密切。它們吸引中共的是它們的原料和戰略礦產。摩洛哥不顧美國的警告，三度出售鈷給中共，其中兩次在一九六〇年，一次在一九六三年。<sup>⑥</sup>此外，尚比亞的銅、摩洛哥的磷酸鹽和蔬菜，蘇丹或烏干達的棉都很吸引中共與這些國家的貿易往來，此正好可彌補中共與激進派國家或地理策略價值國家間貿易上的不足。不過，我們必須強調的一點是，在這時期，經濟的往來絕對不是中共決定是否承認一個政權的關鍵因素。這些經濟因素只有當該國境內無任何革命遠景時，才會被中共列入考慮。中共在自己的領土內本來就擁有足夠供應其工業所需的能源。

註④ 是以，當摩洛哥與蘇丹對其境內之共產活動進行鎮壓時，中共都絕口不提。Cf. Alaba Ogunsanwo *op. cit.*, p. 29.

註⑤ 中共在一九五九年間，加強了其與摩洛哥領袖間的接觸。並提供貸款與軍火給摩國境內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的領袖們。Cf. Waldemar A. Nielsen, *op. cit.*, p. 222. 亦見 Alaba Ogunsanwo, *op. cit.*, p. 28.

註⑥ Alaba Ogunsanwo, *op. cit.*, p. 151.

## 乙、文化大革命對尋常外交的影響

對我們而言，文化大革命對革命化政策的影響不如其對「尋常外交」的影響來的重要。文化大革命既然是鼓吹內政、外交皆激進的一個左派運動，理當對於中共與不夠激進國家間的外交關係影響最深才對。然而文化大革命後，「革命化政策」居然不再被採用，而繼續延用下來的，竟然是似乎應該被文化大革命所唾棄的「尋常外交」。因此我們必須對一九六六到一九七〇年間中共的非洲政策作一番探討，才能明瞭「尋常外交」所以延用下來的原因。

一九六五到一九六九年間與中共斷交國家的數目，以當時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和中共革命言論的誇張程度來看，真是微乎其微。這些斷交的國家，一共有五個，分別是一九六五年的布隆地、一九六六年的迦納、中非共和國和達荷美，以及一九六七年的突尼西亞。令人驚訝的是這五個國家中有四個是中共的革命戰友或被中共認為具有地理策略價值的邦交國家，另外只有突尼西亞是和中共僅維持形式外交的國家。

文化大革命雖然令多數非洲領袖感到不安，却不致使它們與中共斷交。當然，有些國家不得不採取對策，以限制宣傳活動和其境內中共使館人員的行動，不過外交關係還是維持不變。<sup>④</sup>突尼西亞斷交的決定，可以說是該國政府的因素比受「文革」影響的因素大。

突尼西亞總統 Bourguiba 和其它與中共維持「尋常外交」友邦的領袖一樣，經常對中共的政策提出批評，只是 Bourguiba 的態度較其它人更為激烈而已。中共面對這些批評，居然表現出謙卑的態度。<sup>⑤</sup>一九六四年一月中共與突尼西亞建交，周恩來訪問非洲時，Bourguiba 總統曾坦白地表明他不贊同中共對美、印、蘇的態度。不過周恩來還是很慶幸中共與突尼西亞兩國人民的合作及友誼此後仍能有所加強。

不過，有一段很長的時間，雙方的關係基本上維持在很形式的狀態。到了一九六七年二月，突尼西亞外交部長 Habib Bourguiba Jr. 發表言論，認為應該面對現實，承認兩個中國的存在，於是中共與突尼西亞的關係便開始惡化。當然，中共若接受此點看法，則不可避免地，會推翻掉自己自五〇年代以來的外交原則。一九六七年六月「以阿衝突」中，阿拉伯國家失敗，突尼西亞境內舉行示威遊行，致使中共與突尼西亞的關係更加惡化。突國政府認為中共使館人員在示威遊行中散發鼓動叛亂的傳單，助長示威活動。事態日趨嚴重。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四日，中共在一場具有典型「文革」風格的言論中，斷然宣稱，突尼西亞政府行

④ Alan Hutchison, *op. cit.*, p. 145.

⑤ Bruce D. Larkin, *op. cit.*, p. 173.

將倒臺。到了九月廿六日，雙方外交關係便正式中止。<sup>④</sup>

雖說中共確實曾因「文革」鼓吹激進主義，以致言論過於強硬，而且中共對突尼西亞失和，並不像對布隆地、迦納、中非共和國和達荷美的情況一樣，感到惋惜。不過，與突尼西亞的斷交，可以說是起因於突國政府的態度，而非在於中共當局。

最令人驚訝的是，「文革」對於中共與摩洛哥、蘇丹、烏干達或尚比亞等國的外交關係並沒有很大的影響。是故，中共的「尋常外交」在歷經「文革」後仍得以延用下來，<sup>⑤</sup>而且甚至發展成爲從一九七〇年開始中共對所有非洲國家的劃一外交態度。造成這種發展的原因很多，不過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很可能是由於中共非洲大陸革命化策略已告失敗之故。

## 結 論

自一九五六年至「文革」結束，這段時期內的中共與非洲關係，中共一直被迫配合非洲各國的演變，以及隨著中共對非洲情形的逐漸瞭解去調整其政策。當然，一方面也因其有遭遇到的困難必須解決。中共因在一九五四至一九五五年間，在外交上採行「建立形象」政策，而得以在萬隆會議中接觸到非洲。可是，十分矛盾地，中共與非洲接觸後，却又放棄對非洲的這種外交，轉而改採革命化策略。革命化策略乃因中共在五、六〇年間，對非洲認識不夠，只一味認爲其自身之革命應在其它國家重演，所造成的行爲反映。中共的非洲政策完全受中共與美國衝突和中共的革命思想分歧所左右。若非洲反殖民運動之前途未能給中共之世界政策帶來好處，那中共又怎會對非洲這般貧窮、衰弱而又遠離亞洲的大陸發生興趣呢？

中共對非洲認識不清，只以自身去比照非洲，所以認爲非洲必當經過與其相同之革命歷程；亦即先有民族革命，再有社會革命。這種看法，造成革命理論與事實不能配合。中國革命起因於外敵侵入與國土被佔，而一九六〇年代的非洲則既無外敵更未失土。面對非洲國家的興起，中共原可回到萬隆會議時的「建立形象」之外交政策的，可是如此一來較之蘇聯，中共便顯得失去其領導世界革命的抱負。中共在開羅設立使館後，對非洲真象比較瞭解，而且決定將其革命理論，依非洲「無革命之獨立」所引起的局勢變化作調整。從此，中共將重點擺在國家性革命上。所以，當中共發現革命理論與非洲實際不能配合時，方漸漸認知與非洲外交關係的必然性。中共有了國家性革命的觀念後，連帶地，便必須承認各新興國家的疆界及其政府。中共將原有之「解放區」政策轉化成「骨牌」策略並應用於非洲，亦即先以一激進派國家爲「解放區」，再將大陸性革命從此「解放區」傳播出去。因此，中共與激進派國家建立外交關係在所難免。同理，在一國境內製造革命，即「解放該區」，亦需要鄰國在外交上的支持。

④ Alan Hutchison, *op. cit.*, p. 149 et 150.  
⑤ Alan Hutchison, *op. cit.*, p. 142.

不過，當中共利用外交以發展革命的同時，其革命却遭遇到重重挫折。中共革命計畫之結果，大體上而言，是負面的。中共未曾搞垮非洲任何一個政權，甚至也沒有任何非洲政府曾因中共之支持——物質上或思想上——任一革命組織而岌岌不保。沒有一個非洲國家公開承認中共為其革命思想的唯一根源。也沒有一個非洲國家是靠中共的革命扶助才建立起來的。在非洲沒有產生阿爾巴尼亞，也沒有產生北越。中共的這些挫折，要歸因於外在的因素，誠如許多作者所一再強調的，中共在非洲運氣不佳。不過我們還是必須指出的，中共對顛覆活動的援助一直都是很有分寸的，也很謹慎。這一方面是因為中共的能力十分有限。另一方面，則是因為中共一心只想「輸出」自己的革命模式；它堅持，非洲人民必須靠自己，由自己來完成屬於他們自己的革命。若以此觀之，則不論物質上或金錢上，中共之革命成果都絕非慘敗。中共所提供之經濟援助不可與西方國家所提供者相比擬，只是蘇聯一國或美國在剛果危機時所撥出的款項，便遙遙領先中共。<sup>⑭</sup>

中共政策之所以失敗的最主要原因，乃在於對非洲人民的認識不夠，而後又加以忽略。中共將非洲視為其反帝國主義和反蘇修的戰場。此乃與非洲人民的期望及其尋求獨立、和平、建設國家和發展經濟等意願背道而馳。中共頑固地要非洲人民採用既非他們所要，又不適合他們的中共革命模式，以至引起非洲國家的不滿。基本上，這時期的中共所承受到的是其自身革命宣傳的惡果。雖然中共同時也對無革命希望的國家，發展其「建立形象」之外交，然其革命狂熱所帶給它的惡果尚很難祛除。中共一直要到「文革」結束，它再度回到國際政治舞臺上（其目的在求得聯合國中的席位），以及非洲因未能獲得西方國家與蘇聯所提供的援助而感到失望後，才又重新以另一種新的基礎來對待非洲。

於是，一切革命都免談了。中共以第三世界領袖的身分對非洲提供援助。在嘗試將非洲作為其對抗美、蘇二強的戰場不成後，面對超級強國，中共選擇將自己歸劃到與非洲——當然還有亞洲及拉丁美洲——相同的行列上。這種作法，可以說是，中共對其躋身「超級強國」之計畫的放棄。其實在當時，中共要成為超級強國的本錢還不夠。而後，面對西方國家與蘇聯對世界的擴張，中共決定改採與有色民族接近的政策。<sup>⑮</sup>此一政策較像是，由萬隆會議時「中共跨向非洲的第一步」（第三條路線政策）衍生而來，而與「中共跨向非洲的第二步」（反殖民運動）大異其趣。

註⑭ 從一九五四至六六年間，中共對非洲的撥款共計四億兩千八百萬美元，蘇聯所提供者計十九億美元。然而，到了一九七〇至七七年期間，情況完全顛倒過來；中共撥款增加為十八億八千二百萬美元，而蘇聯則只達到十億零四千萬美元。一九六七至七六年間，中共運往非洲的軍火總值為一億四千二百萬美元，蘇聯則為四十四億二千四百萬美元。見 David E. Albright ed., *Communism in Africa*, Indiana Univ. Press, Bloomington and London, 1980, pp. 170, 171, 176.

註⑮ 「七〇年代，中共政治路線的改變，表示中共不再援助黑人對抗黑人的戰鬥。」 Cf Thomas H. Henriksen ed., *op. cit.*, p. 105.

（本文作者原名為 Pascal Ponasse，係法國留華學生，現為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從一九五六到一九七〇年中共對非洲的外交政策